

脆弱与韧性：中国家庭的生命力与现代延续

陈 雯

摘 要：家是理解中国文明实质特点和社会生活逻辑起点的关键。在社会变迁与转型中，中国家庭一方面呈现出强离散化、强解体化、弱幸福感、弱保障支持等典型脆弱性特征，另一方面展现出情感上妥协包容、策略上灵活调适、格局上能动再造等强大韧性生命力。脆弱与韧性成为中国家庭生命力的二元特性，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主导、核心家庭主体觉醒的自救、直系组家庭的代际互助互救、法律规范与保障体系的制度化施救等机制，则共同形成内外双向驱动力，为家庭共同体的现代适应与生命韧性奠定根基。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挑战，中国家庭迫切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合力通过顶层设计、制度保障、法律法规、公共服务、社会支持、文化普及等多方面的赋能支持，发挥“家”的方法和基因优势，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与创新传承。

关键词：中国家庭；脆弱性；韧性；主导机制；现代延续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10-0082-10

一、引言：家是民情底色与文明根基

家是理解中国文明实质特点和社会生活逻辑起点的关键，是“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1]。回望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进程，中国人的“家”始终较大程度地主宰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并支配引导人们的行为，在危机困境中展示出重塑再造的顽强生命潜力与实力。历史和现实一再证实，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中国家庭，在政治上始终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在经济上仍然是撬动并创造中国奇迹和富裕密码的基本单位和行动主体^①，在文化和情感上永远是文明秩序认同建构的长效机制、是强大的总体性观念和“根基性的隐喻”^②。时至今日，面对“百年未有”的时代异变，当代中国家庭正持久地经历一场既“静悄悄”、又“狂风暴雨般”的变革洗礼。近十年来，研究者在持续

的实证研究中^③，亲历亲悟中国人社会生活聚散离合表象下的“家”的总体性、复杂性以及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引领力。面对流动性、个体化、“社会自我主义”^[2]等生活格局变化带来的离散化、解体化、功能虚化、保障弱化、照顾危机等挑战与重创，中国人的家正在时代浪潮冲击中调适坚守。这种生命韧性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奇迹的民情底色与微观密码，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澎湃动力。

中国人的“家”何以看似脆弱，又如此强韧？在当代社会，中国人的“家”应当如何发挥“脆可再生，弱而不息”的顽强生命力？面对中国家庭在社会变迁中持久呈现的脆弱与顽强并存、依恋与抗争共生、理想与现实冲突等社会事实，探寻中国家庭与中国社会的互嵌互构的机制规律，反思家庭文明的源头沉淀与现代转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密切关联个体生命质量提升、社会共同体建设、国家整合凝聚乃至文明稳定延续的重要议题。

收稿日期：2025-08-01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江苏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研究”（25ZHA009）。

作者简介：陈雯，女，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社会和文教教研部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09）。

二、脆弱家庭的当代表征

脆弱性特质是科学领域家庭理论与经验研究不容回避的重要共识,重视变迁社会中的家庭脆弱性、变动性及其对人类命运福祉的关键影响已成为百余年来社会学延续传承的重要学科品质与使命关怀。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遭遇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情境,正推动中国人的家在缔结方式、居住模式、情感联结、支持体系等诸多方面发生颠覆重塑之变革。作为一种生产—生活—命运共同体之家,在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二十余年的社会变迁中呈现出根基松动、功能受损、能力削弱等典型脆弱性表征。

(一) 结构层面的强离散化

结构层面的强离散化主要是指在城乡家庭的整体生命周期中,家庭主体成员在时间、空间等物理层面呈现分开、隔离甚至失散等状态,导致家庭生活分割断裂、日常照料匮乏缺失、沟通交流受限受阻,乃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安全依恋、亲密凝聚、认同归属等情感支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受损。这种状况几乎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整体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各个阶层群体。

从乡村看,由来已久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主导的三重分割机制^[3]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构性力量,在此背景下,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以摧枯拉朽之势撕裂农民家庭的外形,分散居住成为农民家庭的常态^[4]。离散化这一社会事实,及其衍生的显性代价创伤与隐秘危机风险,作为一种“变迁之痛”,已引发政府、学界和民间的持久关注。从1992年的4600万增长至2024年的2.99亿,数代农民继替延续“离土又离乡”、“家户分离”的“民工潮”,在横向关系上,农村夫妻会作出同地外出、异地外出或单方独自外出的策略选择^[5],但在纵向关系上,亲子代际分离则严峻至类战争化,2020年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总量不减反增至6693万且呈低龄化特征^[6]。离别是常态,聚合是特殊甚至意外,家庭化迁移依然任重道远,数代农民的生命历程呈现与子女幼年分离、少年分离、成年分离进而终生分离的总体性特征。

从城市看,家户分离、生活分离、亲子代际分离的强离散化亦未能根本转变及有效缓解。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2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8.58亿人,2024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7.34

亿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48.9小时,这种劳动年龄高占比、高就业参与、高劳动强度,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城市家庭中有家难回、主动不归、出差常态、异地分居、隔代照料、育儿转让等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客观疏离。另一方面,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效应、生育观念变革,以及子女教育、就业、婚育等多重推力,加剧了城市家庭的少子老龄化和提前空巢、“两头空巢”等离散化趋势。

(二) 实体层面的强解体化

实体层面的强解体化主要是指城乡家庭受情感、利益、文化、制度、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在法律上、世俗上或两者意义上呈现出关系破裂、婚姻终结、生活解体等客观现实状态。这既包括主流的通过婚姻缔结的家庭实体的解体,也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相当影响效力的非婚情感关系、非婚生育养育等事实家庭的解体。前者制度化的法律家庭的解体以可见可测的协商自愿或司法程序的离婚为标志支付一定社会成本,后者非制度化的事实家庭的解体则往往通过试婚同居、婚外情(短暂或持久)等隐秘难测的风险隐患巨大的复杂关系纠缠为代价和标志,并且网络信息时代两种解体尤其后者更易引发舆论炒作、道德危机乃至失范失序。

从客观数据看:首先,中国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经经历了1950—1955年的第一次、1981—1983年的第二次和2003年至今的第三次离婚浪潮^[7]。其次,我国的粗离婚率已由1978年的0.18‰,增长至2003年的1‰以上,再增长至2019年的峰值3.36‰,2020年至2022年分别为3.10‰、2.01‰和2.4‰,高于同期欧美及东亚等发达国家。最后,我国离婚率呈现显著的代际和性别差异。一方面,离婚率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而持续上升。在1980—1989年出生的队列中,10年内就有5%左右的婚姻解体;1970—1979年出生的队列中,离婚率有明显上升且婚姻解体的时间更早;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和1960—1969年出生的队列中,婚姻稳定程度都比较高,终生离婚率不超过3%^[8]。另一方面,女性开始在婚姻解体中占主导地位,70%以上的离婚案件由女性提出,越来越多的离婚女性并未再婚。

从根源机制看:一方面,宏观的制度变革与结构力量深刻决定着家庭的凝聚或解体。历经战乱流离、瘟疫疾病、社会转型等重大历史阶段,中国家庭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受到制度、情感、责任^[9]等多个层面的重大冲击而呈现多次分离与解

体高峰。另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婚姻的匹配类型、子女中心主义的传统沿袭等因素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婚姻与家庭的中断与解体。在以团结型关系模式为主的四类家庭代际关系中,子代离婚风险呈现互惠型>支持型>奉养型>互动型的序列化特征,孝道观念会强化互惠型家庭中的子代离婚风险,会弱化奉养型和支持型家庭中的子代离婚风险^[10]。在刻意追求教育水平的“般配”婚姻中,尤其是中、高教育水平的同级匹配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11]。同时,生育又是一把双刃剑,子女的出生和抚养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婚姻冲突与解体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维系着婚姻的稳定与安全。

(三)情感层面的弱幸福感

情感层面的弱幸福感主要是指家庭主体成员对于相互间纽带关系及整体家庭生活质量的评价和体验,一定程度地处于复杂交织甚至下行走低的状态,呈现出期盼与现实、积极与消极、乐观与悲观、进取与保守等矛盾状态的撕扯。

从婚姻关系看,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婚姻稳定性与生育安排^[12]。感情不和、婚姻不忠、暴力倾向等负向因素成为婚姻解体的主要原因。在离散主导的流动家庭中,分离分居、生活异变、亲密受限、交流互动减少等都在较大程度上削弱着家庭成员的幸福感,降低婚姻满意度甚至恶化夫妻关系;在聚合主导的稳定家庭中,感情基础、家务分工、生活习惯等微观细节亦可能成为压倒婚姻的最后—根稻草。

从亲子关系看,当代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子女中心主义”与亲职抚育困境^[13],都在相当程度上重创着家庭幸福体验和良好关系构建。无论“爸爸去哪儿”的疑问,还是“丧偶育儿”、“母职密集”、“共生”的痛诉,抑或“亲情饥渴”、“断亲”的绝望,都体现着亲子关系过度浓密或过度疏离,以及家庭中情感支持偏弱和幸福满意度偏低的脆弱一面。

从代际关系看,整体过强过密的代际关系纽带直接导致或间接加剧家庭夫妻关系的紧张冲突,降低婚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城市化、市场化背景下的高房价、高就业参与、高劳动强度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双重推力强化了城乡家庭的代际联合,遍及农村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14]和城市的“代际共育”较大程度上模糊了家庭系统的“边界”。子代婚育生活在代际支持中深受父辈影响,过多的干涉或过密的关系都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夫妻间亲密关系,导致子代夫妻关系紧张、离婚风险增加。

(四)制度层面的弱保障性

制度层面的弱保障性主要是指,家庭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15]两大核心生产能力的主要承担者,作为社会成员生存安全、生活福利和生命质量的主要保障者,作为社会稳定凝聚的关键力量,却在相当长时期势单力薄地面对整体性治理欠缺、制度保障迟滞、社会政策零散碎片、有效有力支持薄弱、主体定位模糊^[16]等公共领域弊病的现实状态。这种弱保障性导致家庭在社会变迁带来的多元冲击中陷于脆弱被动,为人的现代化发展、家庭整体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埋下多重风险隐患。

从责任范围看,只有家庭,而非任何其他主体,有义务和能力肩负起对个体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支持保障的永久性无限责任,但“全能家庭”在顶层设计和保障体系层面却尚未享受到系统完整的保护与支持。当前我国出台并有效落实的针对家庭整体的支持保证政策屈指可数,且不稳定地分散在民政、卫健、妇联、扶贫等系统,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也不够顺畅。我国近年启动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有”保障体系建设,以其覆盖个体全生命历程的系统化思维彰显出巨大进步,但仍未充分吸纳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对家庭的整体化赋能增能仍有待提升。

三、韧性家庭的顽强调适

家庭作为承载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关键场域,在百年未有之深刻变局中深受冲击,呈现出如前文所述的多重脆弱性。然而更为重要的发现是,脆弱家庭依然顽强;我国14亿多人口依然主要分布在户均2.62人的49416万户家庭中。终身婚姻依然是多数人的理想和践行,婚姻的制度性基础依然稳固,孩子成长仍以家庭为主,65岁以上老人的主要赡养方式仍是与成年子女同住、多代同住^[17]。那么,深受重创的脆弱家庭是如何通过顽强韧性实现实体生命与精神气质的双重延续呢?

(一)情感上的妥协包容

首先,城乡家庭的夫妻双方情感层面均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家的爱和守护。面对生计至上、经济理性衍生的离散化生活模式,夫妻双方多会表现出让渡生计的果断,表达对于离家为养家的道德包容体谅;面对夫妻冲突、家庭变故、感情破裂等

衍生的解体化危机,夫妻双方多会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表现出感情与理性的权衡;面对家务分工、角色适应、三观习惯等方面矛盾引发的婚姻满意度降低,夫妻亦会在相当程度上反思调适、忍耐包容,而较少选择“闪婚闪离”、冲动分离等解体方式。

其次,城乡家庭的孩子们在情感上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对父母最纯粹朴素的依恋、爱护与忠诚,进而较高程度地表现出对父母家计安排及婚姻情感变动的接受与体谅。面对短期或长期的家庭离散化生活格局,孩子们更多表现出依恋双亲却又顾全大局的宽容和隐忍^[18];面对难以避免的父母冲突、家庭矛盾甚至生活变故,孩子们都会一定程度地隐藏攻击性情绪,而更为本能地首选调和父母关系、维护家庭完整,坚守追寻安全与温暖的期盼。

最后,城乡家庭的老人在情感上较大幅度地表现出对儿女子孙的深切眷恋,对血脉延续与家族兴旺的执着期待,进而相应地在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物质与情感等全方位作出妥协与牺牲。正所谓“中国人心中有祖宗、有子孙,把自己作为上下相连的一个环节”^[19]。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城乡老人以守家护家的情感内驱力、留守坚持或魄力漂泊的付出牺牲、护老爱小的情感包容、责任担当的牺牲付出,推动着代际接力时效的无限延长以及边界责任的终生拓展,催化和加剧了城乡家庭的离散化、解体化,抑制了当代家庭虽已萌芽初生但却尚且脆弱的现代独立品质,与此同时却又极其合理、完美地实现私人生活领域至少在形式上延续了传统恪守的家族兴旺、血脉延续、养儿防老的人生使命、情感满足和价值确定性^[20]。

(二)策略上的灵活调适

首先,城乡家庭的夫妻双方出于维护家庭的道德要求、现实需求及情感妥协,在家庭的整合凝聚及变动应对等方面均会采取灵活弹性、调适性、过渡性的应对策略。市场化高劳动强度的工作模式下,家户分离的状况普遍存在于农村与城市的家庭中。在经济动机和家庭伦理的双重驱动下,农村夫妻通常因时因势地调整双方均不外出务工、双方均外出打工、丈夫单方外出或妻子单方外出等决策;城市夫妻也以主动选择、被动接受或协商共识的姿态普遍接受加班出差外派、异地不稳定共同居住等模式。

其次,城乡家庭孩子们通常被家庭采取双亲/单亲自养、隔代抚养、寄宿寄养、自养互养等多种方式养育,进而获得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照顾抚养方式呈现一种或几种生存模式不确定转换的生命体验。在

孩子婴幼儿阶段,时间、空间、精力需求高度密集,城乡家庭通常选择一方辞职育儿或工作搁浅、三代共住、留守隔代、雇佣服务、尽早送托入园等破解之道。在孩子学龄阶段,经济支持和教育提升需求密集,城乡家庭普遍通过居家隔代照顾、离家学校住宿、托管寄宿租房等方式解决生存生活与学业发展的矛盾。在孩子青春期阶段,叛逆、脆弱等变化带来情感需求密集,城乡夫妻往往选择轮流工作、暂停打工、休假辞职返乡职陪读等策略进行调整。

再次,城乡家庭的老人们永不退场。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城乡家庭中50—80岁的父辈们不仅未能退出其成年子女的生活,反而普遍以本地在地或异地流动漂泊的方式,通过时间的无限延长、空间的无垠共享、边界的突破共建、责任的担负共解而全方位参与子女家庭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在婚育构建、家务劳动、隔代养育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形式和情感上实现了生存、职业和家庭三个层面的两代双向发力,保障了中国人的“家”在实体形态和精神内核上实现“离而不散,分而不断”的总体性安全。

(三)格局上的能动再造

深切的情感认同与维护、灵活顽强的策略化应对验证和显示,家庭生产单位、小农家庭农场及三代家庭仍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展示其顽强持续的生命动力^[21],亦展示着中国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独特性。

从乡村社会来看,农村家庭作为“能动的主体”,通过主要劳动力在城乡和城城之间的多向流动、代际接力的生活照料、半工半耕的主流生计模式、现代化受益者而非“牺牲品”^[14]的角色定位、生存生活的主动掌控者而非被动妥协者的心理支撑等策略,重塑了形式离散而实质聚合、纵向主轴结构存续和支配下“分而不散”^[4]、分中有继也有合^[22]的“家业一体”^[23]总体格局。正所谓“进可入城,退可回乡”,中国农民并未走向个体化的“无根”状态,而是既能进城就业、居住,又能回乡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家庭依然是农民现代性适应的有力支撑点。

从城市社会来看,大中城市家庭亦能作为“能动主体”积极主动构建以血缘、亲缘、姻缘为广泛根基的扩大亲属网络支撑,以亲子关系为核心主导、血缘姻缘并重的交往模式,以“互惠互助”等“理性计算”的工具性诉求为核心内容^[16],实现子代家庭的主动适应,进而有效地重塑了家庭生命周期中收入保障、职业发展、生儿育女、老人照护、婴幼儿抚育等重大事件“三代共享共赢”的总体格局。

历史和现实已经书写,血缘家族曾经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以其高度强固性和坚韧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与演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助推作用^[24],当前亦在城市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化解体后的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替代国家和集体成为担负个体社会保护责任的全职全能式“保姆”。城乡普及化持续化的直系组家庭结构^[25]、网络化家庭生活模式、“临时主干家庭”^[26]规模特征等再一次验证,城乡家庭并没有完全遁入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通过家庭系统的内在调试和功能激活更加深入地嵌入流动的現代性系统。中国的功能型家庭以制度层面的功能外移、结构分离和伦理弱化释放巨大能量回应現代性压力。在家庭发展主义的功能性目标引导下,家庭伦理价值以新的形态延续,且构成了转型时代家庭整合的粘合剂,赋予家庭以高度的韧性,这种韧性正是中国城乡家庭保持活力的源泉和奥秘^[27]。

四、脆弱与韧性:中国家庭生命力二元特性的主导机制

古今中外,“家”始终占据着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理解世界基本路径的本体论地位^[28]。伴随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中国家庭呈现出了多元多维的复杂格局:一面是经济外驱推动力下或短暂或持久的离散脆弱,一面是情感伦理内驱合力下或主动或被动的弥补妥协;一面是个体化、核心化等独立内核驱动下对婚恋家庭美满的憧憬,一面是集体化、一体化等互助内核沿袭下的秩序关系重塑及婚育复杂化的现实;一面是与发展相比较为滞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体系,一面是家庭内部全龄人口的多维策略性应对。这就是剧变时代中国家庭所展示的既脆弱又坚韧、既理想又务实、既顽固又妥协的二元性矛盾特质,亦是中国家庭“脆可再生,弱而不息”的现代韧性与强大生命力。中国的韧性家庭蕴含着可扩大可缩小、可离散亦可聚合的结构韧性,可紧密可松散、甚至可个体亦可一体的关系韧性,可独立亦可联合的模式韧性等典型特征,彰显着中国家庭生命力现代延续的内生动力与调适能力。何以如此?可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其内在机制。

(一)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主导机制

纵观五百余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催生的“离家出走”及接踵而至的碎片解体、危机灾难,家庭在西方世界因祸得福成为“促

成公共领域产生的部分背景”^[29],家庭政策成为政府迎合现代经济政治发展与运行需求的重要抓手^[30]。纵观百余年来中国近现代文明历程,“家”虽多遭变动,但并未脱离其在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基础性位置,作为内生动力的家庭庇护和集体主义等传统精神,不仅在延续千年的农业社会里支配主宰着人们的心理,在“时空压缩”和“四化同步”的现代转型城乡社会中依然坚韧顽强。

首先,家是依托与归宿的关键地位巍然难撼。在现代社会,家依然是“无情世界的避难所”,结婚生育依然被看作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指标,成家立业依然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诚如始于美国大萧条社会动荡时期、历时76年的“格兰特研究”所验证的:青年时期建立亲密、健康、良好的关系密切相关乎人生的幸福与成功。深受乡土文化、父权至上、代际秩序等传统观念,打工经历、教育技能、城市体验等现代社会因素,以及家庭“弱化”、婚育“催化”、独立依附并存等个人成长经历的重重影响,上亿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31]等婚恋模式。而“并家婚”^[32]、“招赘婚”等多元化婚配模式也在城乡家庭中均不鲜见,这恰恰体现出少子化时代青年人口资源的稀缺性,及青年人通过结婚成家实现社会属性的功利性与迫切性。

其次,家是载体与容器的核心功能不减反增。家依然是人性的养育所,婚姻与家庭依然是人类生育繁衍再生产活动最具有制度安全与文化合理的民情容器。在我国,夫妻是生育主体,合法生育并不取决于育龄人口是否具有生育条件,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依照法律进入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家才是生育依附的合法合理合情载体,这也造成单身女性实力能力的发展与单身女性不能获得生育权成为当代中国晚婚不婚和低生育率陷阱的一对悖论^[33]。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早婚”与“普遍婚”的婚姻期待依然存在,生育对婚姻牵制较强。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夫妻婚内生育比例较高、生育意愿较为普遍,子女对婚姻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34]。

最后,对家的主流认同恰恰是诸多失范乱象甚至危机叛逆的“镜像”反证。一方面,正是主流文化心理层面对恋爱婚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等生命秩序的高度认同,才促使不婚不育、非婚生育等有违于此种秩序的现象更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引发社会焦虑甚至道德审判,丧偶单亲、离婚再婚等家庭破

碎与重组才会成为人生不幸甚至重大创伤,从而获得更多照顾同情和兜底保障。另一方面,正是人类对情感需求的规律认同与期盼依恋,才会衍生现实与网络多重渠道支持的择偶婚配路径,才会出现与传统“嫁娶婚”并行共存的新兴多元化婚配模式。由此亦不难理解近年来彩礼纠纷、婚恋诈骗在各级司法案件中占比渐涨,防范婚恋情感诈骗成为“全民反电诈”一大主攻方向,而“断亲”“搭子社交”“原生家庭罪”等现象引发集体关注、社会焦虑和道德谴责,使青年网民陷入深度精神困境^[35],这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由家庭不幸经历导致的生命质量受损、幸福体验缺失的一种叛逆验证。

(二) 核心家庭主体觉醒的自救机制

面对中国家庭在实体形式与精神气质层面呈现的“脆可再生,弱而不息”的坚韧品质,核心家庭的概念、实体及其所依托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与标准性不断式微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36]。但亦值得重视的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宏观数据和本项家庭生命史的跟踪研究再次验证,无论何种居住形式与关系模式,城乡家庭的结构小型化、关系平等化^[37]、情感私密化、儿童子女中心化等核心“现代”特质已趋于势不可挡。正式跻身“当家人”的“70后”“80后”,以及“90后”“00后”等婚育主体,正通过边界维护、外援寻求、内在提升等内外兼修的途径,努力维护核心家庭的形式完整与内核稳定,以有力抵御各类风险侵蚀。

首先,基于情感基础的夫妇式核心家庭通过边界维护构建生活共同体。作为婚姻主体和家庭主人,夫妻双方对婚姻家庭边界的捍卫表现在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在家业初建期,新居制、双系制与独立生活成为理想与主流,与之匹配的乡村新房建设、县乡城市商品房购置延续盛行;至家业扩展期,持续或阶段性的离散化与扩大化生活模式伴随子女出生和婴幼儿抚养成为主流,由一代户扩展为两代户甚至三代户,衍生诸多代际与代内矛盾冲突,所谓“婆媳矛盾”“翁婿冲突”“代沟”“共生”等常见现象正是家庭边界侵犯与维护、家庭权力博弈与平衡、家庭关系共生与冲突、家庭主体觉醒与自救的外显。

其次,核心家庭主体基于对家的认同与维护,通过向外寻求援助破解家庭脆弱风险与危机。向外求助亦是一种自救。中青年夫妻在化解婴幼儿抚养等生活照顾压力时,会选择双系家庭或血缘亲属家族参与,或者市场化服务购买;在化解婚姻中的生活习惯冲突、价值观念差异、婚姻信任忠诚等情感压力

时,会寻求心理咨询服务等专业力量的帮助,或向同辈群体、父辈长辈、网络平台求助。

最后,核心家庭主体基于对家的认同与捍卫,通过自我提升破解家庭脆弱风险与危机。无论是工作家庭平衡、夫妻关系改善,还是亲子关系缓解,乃至三代及家族关系磨合,中青年一代在面对婚姻家庭生活中遭遇的冲击困境时,会或主动或被迫地内观自省,发现自身的脆弱与缺憾,关注自我成长与人格完善。这种独立成长的意识、能力和行动,是人在生命历程中必然面对的一场自我革命,也是中国人在对美好家庭与幸福人生的追索中深沉而高贵的自我救赎。

(三) 直系组家庭的代际互助机制

核心家庭主体的自我维护并不排斥对亲属网络的依赖求助,在家庭化福利保障体系尚较为薄弱的情境下^[38]，“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形态“现代”、关系“传统”的直系组家庭^[25]及其提供的网络化“互惠互助”，成为贯穿城乡家庭构建、生存、发展等全生命周期的关键支撑力量。

一方面,直系组家庭的代际救助贯穿新生家庭全生命周期,尤其彰显于子代成家立业过程中的若干重大事件。这包括“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代际互惠^③、“恩往下流”“啃老”的代际剥夺^④、“家业一体”的代际共赢^⑤等复杂格局,在时间上无限接力延续,在边界上无限突破融合;包括父母对子代家庭初建期关键根基的付出参与,不仅父辈认同与父辈对子代婚姻家庭的物资情感支持成正比,而且父母家庭成为个人获得住房的重要因素,呈现“再家庭化”趋势^[38];更包括城乡广泛认同与普遍持续的“代际共育”这一重要社会事实。尽管三代共同生活不得不面对传统“一体”与现代“个体”之间的复杂交织,呈现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的双重特征^[39],但正是得益于祖辈的鼎力协助,城乡家庭尤其是城市新移民家庭才得以渐进实现生存与延续等家庭现代化要素。

另一方面,父辈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和付出深受情感、伦理、社会等内外机制驱动,彰显着中国人生命历程的二元代际悖论^[20]。如前文所述,城市化进程加剧着中国家庭的离散化和提前空巢,为儿女置业成家提供支持成为中国父母再度实现亲子联结的关键纽带,甚至一种“补偿式安慰”^[31]。少子化背景下,“50后”“60后”“70后”等中老年群体的养老观念虽然一定程度上正发生着从依赖儿孙到独立自养^[40]的转变,但“代际共育”恰为父辈提供了走

近儿孙、家庭聚合的新契机。父辈通过妥协保障维护子孙利益最大化,以代际接力无限延长、代际互助责任无限守护着家庭的稳定,这份中国父母提交的温情与冲突并存的答卷,更是一种在传统与现实折中延续中实现的自助自救。

(四) 法律和保障的制度化施救机制

历经战争的创伤与代价,人类自二战以后开始高度关注自身的健康福利和生命质量,生命的完整度和幸福度成为衡量个体生命质量和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西方福利国家从构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到出台“发展型家庭政策”,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整体的支持,家庭作为攸关社会成员福利资源的社会基本单元,关乎国家的未来与可持续发展^[41]。“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是贯穿革命和建国的内生动力。历经76年的发展,我国针对保护家庭和个人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渐进式制度化建设与突破,尽管在更新时效、质量层次等方面距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仍有诸多不足,但却持续发挥着补救式、兜底式的施救和维护机制,也强化着民众在个体化自由化思潮冲击下对家庭主体意识的维护与坚守。

首先,国家通过《宪法》《婚姻法》《民法典》等立法手段对家庭整体及其内部的代际关系、婚姻关系的权责边界作出制度化的保护和管理。一方面,法律规范对宏观意义的家庭延续、横向家庭纽带、整体代际关系始终提供底线支持和责任强化。如1982年《宪法》、2018年《宪法修正案》第四十九条均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2021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对婚姻的保护和救助主要秉持“性别间平等”和“个体的自由”等相对“现代”的价值原则^[42]。《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结婚和离婚均以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为基本条件。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具有权威严厉的外在保护机制,很大程度地激活了家庭的反脆弱与自救能动性。

其次,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着家庭主体的全生命周期,保障水平从兜底救援型的底线生存,到普惠基础型的发展提升,保障内容从收入和就业等生存生

活基本层面,到教育和健康等发展传承层面,呈现出渐进式改革与历史性跨越,直接或间接地为城乡家庭的建设重构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着基本的依靠甚至关键的补救。如“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攻坚阶段,农民被触动和激发的正是对“家”的执着和向往。真正的内生动力不仅来自于个人脱贫致富的愿望,更来自于家庭。国家力量在下沉农村中顺势而为,迎难而上,不但没有摧毁农村的家庭本位社会结构,还赋予这种社会结构以澎湃的动力^[43]。除此之外,“扶贫先扶智,扶智以扶志”、遏制“贫困的代际传递”的教育扶贫理念,建构并织密“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助力健康优质生命质量等等,都是对社会个体成员的特殊性临时性施救帮助,从外部发力,赋能家庭共同体的平稳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五、韧性家庭现代延续的挑战与应对

一个理想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44]。一个现代社会,必然是以培养身心健康、自强不息的现代人为目标的社会,家庭历史上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将来永远是这一现代化目标的理想起点与归宿。中国家庭作为联结个体与社会的纽带组织,融物质、情感及精神实质于一体,蕴含无尽生命动能,已经在漫长社会变迁中展示出了“弱而不息、脆可再生”的生命韧性,支撑起中国社会的稳定奇迹。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和未来,面对时代抛出的人口危机、情感危机、共同体危机等严峻风险挑战,韧性家庭必然要通过整体性治理、制度化保障、新旧文化整合等应对思路实现现代延续。

(一) 韧性家庭现代延续的风险挑战

1. 可见可测的人口危机

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构成了21世纪的人口危机,而生育赤字和低生育意愿是这场危机的“原爆点”^[45]。中国在半个世纪内经历了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生育意愿低、生育二孩比例低、婚育年龄不断推迟成为中国20多年来低生育现象的三个典型特征,年龄结构上的“未富先老”与生育率上的“未富先低”并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46],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0,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1.5警戒线;至2020年年底,我国2.62人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经跌破“三口之家”;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人,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

增长现象。与此同时,中国老龄人口 2024 年已超过 3 亿,“空巢青年”接近 1 亿,上亿的空巢青年和单身人口等生育的主力军没有“投入战场”,而是被隔离在婚姻家庭围墙之外,中国家庭已开启空巢化,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高风险社会”^[47]。

更值得深思与重视的是,无论是离散化催生的亲子关系异化^[18]、高劳动强度衍生的养育兼顾压力,还是婚姻情感发展调适中的弱幸福感、代际共育或夫妻独育中的养育艰辛,这些显性或隐形动因所驱动的人口危机,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代转型的家庭内部,而家庭又正是拯救危机的关键突破口与强大支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口危机亦是一场家庭危机,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现代家庭的适应延续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家庭现代治理迫在眉睫。

2. 现实紧迫的共同体危机

数量庞大的“一老一小”的“照料赤字”,作为社会扶养主力和财富创造主力的中青年群体的“时间赤字”“休息赤字”,现实压力与情感伦理双重驱动下代际共育中的关系冲突等,构成家庭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境,严峻考验着中国家庭共同体的整合凝聚与稳定持续。

一方面,加速老龄化和持续少子化背景下,中国家庭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难题,婚育延迟意味着家庭内部出现照顾儿童与照顾老人时间重叠,带来家庭照顾资源的代际竞争,家庭存在难以兼顾老与小的精神焦虑和实质性压力^[48]。另一方面,作为照顾主体、婚育主体和养家主力的中青年,一边面临自身工作超长工时和超高强度带来的“休息赤字”,一边面临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带来的家庭冲突及关系聚合难题。同时,始于维护和凝聚家庭共同体初心的“代际共育”,也带来了父辈老人“休息赤字”、精神孤独,以及子代家庭冲突增加等共同体建设危机。

3. 隐匿莫测的情感危机

无论是闲暇却空巢孤单的老龄人口,还是繁忙至无暇休息的中青年人群,中国人都在时代变革与洗礼中集体体验着一场对情感联结与关系建构既渴求理想化、又在现实中屡屡失望的深层悖论。

令人恐慌的是,在信息时代的快节奏、数智生存的生活转换、城乡生活的高压力、代际关系的复杂重塑、婚恋关系的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众多中青年网民通过“断亲”“失联”等极端方式排斥源于血缘亲缘的强关系联结,对原有关系网络实施“自我革

命”,显示出个体的自由随性和精神迷茫^[35]。而且,这些极端方式不仅存在于流动生活主流的中青年群体,甚至已蔓延至被集体化和家庭主义庇护多年的中老年尤其是女性群体。与此同时,具有功用主义趋向和情感满足功能的“搭子社交”“宠物交流”“电子父母”“机器人陪伴”“AI 恋爱”等网络化、虚拟化交往方式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人对婚恋等家庭关系的逃避,阻滞了青年人口的情感成长,疏离了原生家庭的亲情纽带关系,对现代人的情感建构与归宿构成巨大挑战冲击。

(二) 中国家庭现代发展的应对思路

回溯传统,“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同构和修身齐家治国相通的社会观强化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国家认同感^[49]。走进现代,“家”作为一种总体性和“根基性的隐喻”,为理解中国社会构成和变迁的总体性实质特征提供了分析框架,是推进文化自觉和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切入点^[30]。立足当代,“社会政策即是家庭政策”^[41],兼具脆弱性与坚韧性双重特质的中国家庭的现代延续迫切需社会多元主体合力通过顶层设计、制度保障、法律法规、公共服务、社会支持、文化普及等领域的赋能支持。这是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遵循“不忘本来”、借势“历史惯性”地尊重家庭形式的多元多样,维护家庭功能的归属保障,提升家庭实力的调适能力,亦是发挥“家”的方法和基因优势赓续中华文明的创新传承。

一是着力顶层设计,从制度理念、国家机构、法律法规三个重点层面增强现代家庭的整体治理模式,提升家庭的共同体整合功能。

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持续明确家庭的重要地位,尊重保护现代家庭从组建到消亡的客观生命规律,确定并强化家庭作为个人可进可退的情感依托和政治保障,把人口从出生、成长、发展到衰老、死亡的全生命周期作为整体渗透到家庭管理过程中,构建以支持核心家庭和中青年父母为支柱、个人和家庭福利分离整合弹性畅通的整体性家庭支持系统。其次,确定整体性治理的权威部门及其主导性治理的整合能力和稳定地位,切实提升卫健、民政、妇联、教育等多部门有效协同治理效能,为家庭系统可持续发展中系统化、集成化整合资源的效率和效力提供坚实依托。最后,提升法律法规在保护家庭发展能力、治理家庭敏感问题等方面的权威和引领作用,科学区分家庭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边界和原则,以法治化水平的提升增强全龄人口的婚姻家庭信心。

二是着力保障体系,夯实针对家庭的全周期发展型制度支持,通过织密“安全网”提升人口尊严和生命质量。

首先,继续从贫困、疾病、就业、医疗、教育等特定重点领域加强对家庭整体和个体的兜底保障与政策扶持,持续有效地遏制家庭的“因病致贫”“因教致贫”“因懒致贫”“贫困代际传递”等“社会病”,全方位赋能支持各类弱势家庭首先实现健康完整地生存下去。其次,夯实中青年夫妻的家庭主体地位,提振其作为家庭主人翁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通过新生儿补贴、托育服务、老人照顾等制度化措施减轻家庭的“一老一小”照顾压力,助力城乡家庭实现修复、完整与发展。最后,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高质量人口服务体系,让每个年龄阶段的人口都能切实享受到针对家庭的福利保障和实际利益,主观上都能真切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美好。

三是着力文化引导,维护传统文化的经典保留及适时适度的现代转换,实现现代家庭在实体结构与精神气质两个层面的健康文明发展。

首先,以国民教育体系、多元传播媒介、城乡基层社区为核心抓手,强化家庭地位的心理主导机制,并落实社区村镇家庭实体硬件设施的改善,将其作为家风家教传播落实的质量保证,在精神和实体两方面筑牢家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重视从情感价值重点突破,倡导“为爱而生,以生养爱”的婚育价值观^[50],在教育体系中融入积极健康的家庭文明风尚,尤其注重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设优质稳定的婚恋家庭课堂,普及健康的婚育知识和家庭观念。接受并尊重青年群体的婚育意愿,鼓励家庭实现自主生育,淡化对生育行为限制或鼓励的聚焦人口指标的思维方式^[46]。最后,构建以生育友好、生命友好、生活友好的“三生友好”为基本原则的整体公共服务体系,涵盖儿童阶段(包括孕产保健、婴幼儿免疫、托育教育等)、成人阶段(包括安全健康、教育就业、婚恋生育等)、老年阶段(包括生活照顾、医疗护理、安宁疗护等)等“三阶段”的育儿友好型社会环境^[50],以及覆盖全龄人群的优质人口支持和服务体系。

注释

①参见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等。②参见李剑:《帝国认同的建构及其限度》,《国家研究》2022年第1辑;肖瑛:《“家”作为

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等。③参见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许琪:《扶上马再送一程: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社会》2017年第2期等。④参见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怀默霆:《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现代化的悖论》,《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等。⑤参见曾旭辉、李奕丰:《变迁与延续: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社会》2020年第5期;郑丹丹:《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等。

参考文献

- [1]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4):98-122.
- [2]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172-191.
- [3]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J].社会学研究,2015(5):164-188.
- [4]陈映芳.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当下中国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给机制分析[J].社会,2020(6):71-91.
- [2]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探索与争鸣,2017(7):4-15.
- [3]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6(5):85-106.
- [4]何奇峰,周芯宇.何以为家:分而不散的农民家庭[J].社会,2024(1):149-177.
- [5]李代,张春泥.外出还是留守?——农村夫妻外出安排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6(5):139-163.
- [6]吕利丹,梅自颖,李睿,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J].人口研究,2024(1):103-117.
- [7]杨菊华.中国离婚潮的变动轨迹与性别模式:经验数据中的理论逻辑[J].探索与争鸣,2023(9):111-124.
- [8]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J].人口研究,2019(9):3-16.
- [9]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33-145.
- [10]张波.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J].社会学评论,2023(6):125-145.
- [11]李兵,赵沛炫,郭冬梅,等.教育水平“般配”就能幸福终老吗?——正向教育选型婚配倾向与离婚率[J].经济科学,2024(3):199-219.
- [12]杨雪,谢雷.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J].人口学刊,2022(2):44-56.
- [13]陈雯.亲职抚育困境:二孩国策下的青年脆弱性与社会支持重构[J].中国青年研究,2017(10):37-42.
- [14]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
- [1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 [16]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
- [17] 於嘉,何雨辰.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家庭特征的转变[J].学术月刊,2024(3):129-142.
- [18] 陈雯.流动的孩子: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与代际传递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9(1):92-106.
- [19]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6-15.
- [20] 陈雯.“老漂族”生命历程二元代际悖论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2(1):102-112.
- [21] 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1(5):82-105.
- [22] 麻国庆.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9(1):106-117.
- [23] 敖雅萱,陈顺.“家业一体”:另一种农民城市化模式[J].社会,2023(6):26-53.
- [24] 吴忠民.农村历史性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24(8):4-22.
- [25] 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地阿基关系分析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07-132.
- [26] 姚俊.“临时主干家庭”: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动与策略化——基于N市个案资料的分析[J].青年研究,2012(3):85-93.
- [27]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4-60.
- [28]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4.
- [29] 泰勒.现代社会想象[M].林曼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92-93.
- [30] 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172-191.
- [31] 陈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7(6):156-168.
- [32] 沈毅.双系家庭主义、代际关系嵌入与第三代姓氏选择:基于南通地区二孩姓氏“一边一个”“并家婚”案例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4):66-74.
- [33] 陈雯.解放的烦恼:单身女性的生成机制与风险挑战[J].中国青年研究,2023(9):25-31.
- [34] 於嘉.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J].妇女研究论丛,2022(5):47-69.
- [35] 蒋建国.从“断亲”到“搭子”:青年网民的社交转向与情感纠葛[J].南京社会科学,2024(5):91-100.
- [36]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0(3):199-222.
- [37] 麻国庆.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J].人口研究,2023(1):43-57.
- [38] 钟晓慧.“再家庭化”:中国城市家庭购房中的代际合作与冲突[J].公共行政评论,2015(1):117-140.
- [39] 纪莺莺,阮文雅.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J].社会,2024(2):61-97.
- [40] 龙书芹,杨春华.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中国民众的养老意愿及其代际差异[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04-112.
- [41] 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3(6):84-96.
- [42] 陈映芳.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当下中国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给机制分析[J].社会,2020(6):71-91.
- [43] 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J].社会学研究,2021(6):1-22.
- [44]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1.
- [45] 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J].社会学研究,2020(4):218-240.
- [46] 郑真真.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从亚洲看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2021(3):65-85.
- [47] 穆光宗.当前中国家庭小型化的社会意涵[J].人民论坛,2021(21):68-71.
- [48] 钟晓慧,彭铭刚.养老还是养小: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J].社会学研究,2022(4):93-116.
- [49] 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113.
- [50] 蔡昉.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J].劳动经济研究,2020(6):3-6.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Vitality and Modern Continuation of Family in China

Chen Wen

Abstract: Famil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China, and is the spring of Chinese social life. We must face a series social fact of family in modern China, so we should find the regulations between family and society. This research on Chinese family's characters and regulations finds out some important aspects: (1) Family in China has shown four typical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s strong split, strong disintegrating, weak happiness and weak security during short but shocked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2) Vulnerable family shows powerful vitality and modern resilience of “fragile but reborn; weak but regeneration” by compromising emotionally, adjusting behaviorally and reconstructing dynamically; (3) There are four dominant mechanisms supporting the family's modern adaptation and vitality: general and key mechanism of family culture, waking up and self-redemption of nuclear family, interacting help and rescue of the lineal family, systematized rescue of law, policies and social security; (4) Family in China must overcome challenges and risks from population, community and emotion.

Key words: Family in China;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dominant mechanism; modern continuation

责任编辑: 苇 如